

研究論文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毛澤東追悼會的圖像生產與當代中國記憶 體制的變遷

李紅濤

## 摘要

媒介事件是「歷史的現場直播」，但並不是所有媒介事件都能夠進入集體記憶，成為「電子紀念碑」。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九天後，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百萬人追悼會，實況轉播讓「哀樂聲傳遍祖國城鄉」。然而，這樁規模空前的媒介事件卻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間消逝了。本文將毛澤東追悼會的生命歷程視為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通過分析官方圖像的(再)生產與流通，考察電子紀念碑的生成和消逝。本文發現，20世紀70年代以偉大領袖和效忠關係為核心的記憶體制形塑著媒介事件的展演，也令四人幫被打倒後相關圖像被強制擦除；而改革年代側重中共歷史功績和當下合法性的記憶體制則導致華國鋒的圖像和「宣誓」符號消失，其背後的「繼續革命」腳本瓦解。毛澤東的逝後加冕

李紅濤，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閩江學者」講座教授，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媒體與集體記憶。電郵：lihongtao@zju.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19年3月5日。論文接受日期：2019年11月25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禮不再是「全民癡狂」的國家儀式，而是被重構為中國走出低谷的轉折點；過往也從舉足輕重的事件變為遙不可及的「異邦」。

關鍵詞：毛澤東追悼會、媒介事件、圖像再生產、視覺記憶、記憶體制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8 (2021), 61–97

---

Research Article

## **The Fading of an Electronic Monument: Visual Productions of Mao Zedong’s Funeral and Shifting Memory Regim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gtao LI

---

### **Abstract**

Media events are a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but not all media events etch themselves in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become “electronic monuments.” Mao Zedong died on 9 September 1976. Nine days later, a grand state memorial involving one million people was held in Tiananmen Square, which was broadcast live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national mourning ceremony, however, gradually faded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By conceptualizing the life cycle of the media event a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images associated with Mao Zedong’s death to explore shifting memory regim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making and fading of an electronic monument. We contend that the memory regime in the 1970s centered on the allegiance to a supreme leader, which shap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dia event and led to the suppressive erasure of the images of the Gang of Four after they were removed from power. In the reform era, a new dominant memory regime was form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current concern regarding legitimacy. In the process of rewriting the historical script of the recent past,

---

Hongtao LI (Minjiang Guest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media and collective memory.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8 (2021)

Hua Guofeng vanished, and the iconic images of “taking oath” and the underlying script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 also collapsed. Since then, the unprecedented state ceremony has been reconfigured as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recent Chinese history, and a decisive event in the past has also been rewritten as having occurred in a “foreign country.”

**Keywords:** Mao Zedong’s funeral, media events, visual reproduction, visual memory, memory regim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i, H. (2021). The fading of an electronic monument: Visual productions of Mao Zedong’s funeral and shifting memory regim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8, 61–97.

## 致謝

本文初稿曾在「媒介、歷史與記憶」工作坊（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和「傳播與中國論壇」（2018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宣讀，感謝單凌博士、黃旦教授、夏倩芳教授、孫五三研究員的評議。感謝楊國斌教授在選題階段的指點，感謝潘忠黨教授對論文初稿的點撥和過去數年間的悉心指教。感謝《傳播與社會學刊》評審建設性的意見。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免費使用《紅色新聞兵》中收錄的圖片，感謝新影集團授權使用紀錄片截圖圖片。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媒介事件的公共記憶及其機制研究」（項目號：20YJA860005）資助。

## 引言

2018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42週年紀念日。當天零時剛過，「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發佈紀念微博〈今天，紀念一位偉人〉。當天一早，《人民日報》也發佈微博〈42年前的今天，毛主席逝世〉，獲得一萬餘條評論、三萬多次轉發。兩條微博都引用了毛澤東語錄，附上了九幅圖片，但這些圖片均是毛澤東生前的照片，沒有一幅與其逝世和悼念活動有關。

2019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43週年紀念日。「人民網」微信公眾號刊發文章〈那年十里長街人群悲慟，只為送您！〉，稱「當年送您的十里長街，如今已是十里繁華」。《人民日報》也發佈了紀念微博，稱「他身後沒有子女和財產，卻有十里長街百萬群眾灑淚送別」，配圖最後一張集成了四幅圖片，分別是靈車駛過長安街的圖片和民眾哭泣的特寫。

無論是42週年還是43週年，都是普通的紀念年份，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紀念卻呈現出不同的景觀：「十里長街送總理」成為周恩來一生的高光時刻，但毛澤東的紀念中卻尋不到半點1976年的影子。人們似乎忘了，40多年前，毛的逝世觸發了一場規模空前、曠日持久的國家悼念活動。其中，9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人追悼大會，由廣播電視轉播，各地追悼會都要「先收聽北京追悼大會的實況」（新華社，1976年9月10日a），這讓毛澤東追悼會成為當代中國最早、規模最為宏大的媒介事件之一。

媒介事件是「歷史的現場直播」（Dayan & Katz, 1992），大規模的媒體報導和節日般的觀看往往會在公眾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乃至變成個體生命與世代的分水嶺：

媒介事件堪稱電子紀念碑。它們注定進入集體記憶，這要麼是因為它們與所回應的創傷事件緊密相連，要麼因為它們提供的喜悅和滿足感超乎尋常。想想看，對甘迺迪總統的記憶將會永遠喚起電視螢幕上的葬禮畫面。（Dayan & Katz, 1992, p. 21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甘迺迪葬禮和柏林牆倒塌等媒介事件的確為世人所銘記。然而，並不是所有媒介事件最終都能夠進入集體記憶，成為電子紀念碑。毛澤東追悼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個案：當代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媒介事件卻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間消逝了。曾經充斥螢屏和耳畔的影像及聲音為何不再流通？事件儘管或許還留在親歷者的記憶深處，卻為何無人再提起？本文以毛澤東追悼會為個案，致力於探討媒介事件進入集體記憶的政治和文化邏輯。通過系統收集和分析毛澤東逝後的官方圖像，本文試圖追溯事件從盛大演出到黯然消逝的生命歷程，聚焦媒介事件腳本的建構、延續、斷裂與瓦解，從而增進對媒介事件生成邏輯、集體記憶機制以及當代中國記憶體制(memory regime)變遷的理解。

本文的重心不是親歷者對毛澤東追悼會的追憶，而是媒介事件經由圖像生產與再生產，在公共話語空間中展現出的生命歷程。接下來，我將首先評述有關媒介事件及其影像記憶的文獻，闡明個案的理論意義和研究的問題意識。論文的主體部分沿著電子紀念碑的生成與消逝展開，先是討論媒介事件的展演過程，分析紀實影像如何為「最高領袖」加冕，又如何建構出「宣誓」這一標誌性的符號和繼續革命敘事。接下來，本文的討論聚焦媒介事件在當代的生命史，先是四人幫和華國鋒影像的消失，再是毛澤東追悼會在當代影像記憶中的消逝。最後，我將從記憶體制的視角闡發消逝背後的政治和文化邏輯，並探討本文對於媒介事件與集體記憶等領域的可能貢獻。

## 媒介事件及其視覺記憶

媒介事件是「大眾傳播的盛大節日」，它們「凸顯了社會的核心價值或集體記憶的某些側面」(Dayan & Katz, 1992, p. ix)。作為獨特的媒體傳播「樣式」，媒介事件在句法、語義和語用層面具有一系列鮮明的特徵。在句法層面，媒介事件打破常規，壟斷各類播出渠道和平台。在語義層面，媒介事件常被視為「歷史性的」轉折點、賦予儀式性的尊崇地位、傳遞「和解」和社會整合的訊息。在語用層面，媒介事件總是能夠吸引大規模的受眾，一國、一地區乃至整個世界都可能捲入「節日性的」觀看之中(Dayan & Katz, 1992)。

Dayan與Katz (1992) 提出媒介事件的三種「腳本」，分別是競賽、征服和加冕。三種腳本都包括強烈的儀式成分，但「加冕完全就是儀式」(p. 26)。加冕遵照傳統賦予的嚴格規則進行，它「提醒社會關注自身的文化遺產，重申社會和文化上的延續性，並邀請公眾對現狀展開評估」(p. 37)。在「整合性的事件」之外，研究者近年也將戰爭、恐怖和災難等破壞性的事件 (Hepp & Couldry, 2010; Katz & Liebes, 2007) 或幻想破滅、脫軌和衝突等元素 (丹尼爾·戴揚、邱林川、陳韜文, 2009; Dayan, 2008) 帶入媒介事件的範疇。

集體記憶在Dayan和Katz (1992) 的論述中處在較為邊緣的位置，他們更多抱持「以當下為中心的事件觀點」，將「事件凍結在時間裡，遮蔽了其過去和未來」(Sonnevend, 2016, p. 10)。實際上，媒介事件的展演中即包含「記憶」元素，通過文本和圖像構造特定的歷史敘事往往是事件腳本的有機組成部分，由此在觀眾心中喚起或悲傷或榮耀的情感，激發政治和文化認同 (潘忠黨, 2000; Lee, Chan, Pan, & So, 2002; Zelizer, 1992)。

媒介事件本身，則有可能在不同話語場域中經由不斷的重述而進入特定社群乃至一般大眾的集體記憶。無論是天安門事件、柏林牆倒塌，還是911恐怖襲擊、台灣921大地震，週年紀念日都會成為新聞媒體和公眾重訪事件的話語契機 (Li & Lee, 2013; Somerstein, 2015; Sonnevend, 2016; Su, 2012)。此外，媒介事件中的敘事元素也會經由日常語言或轉化為新聞標誌 (news icon) 而進入或觸及當代政治實踐與文化生活 (Lee, Li, & Lee, 2011; Schudson, 1992)。人類登上月球、葉利欽站上坦克、水門事件聽證會、柏林牆倒塌等事件一發生便「載入史冊」，但它們的意義卻會隨著時間而變化 (Li & Lee, 2013; Liebes & Katz, 1997; Schudson, 1992; Song & Lee, 2019; Sonnevend, 2016)。

在維繫媒介事件記憶的過程中，新聞傳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抱有各自的訴求，既可能彼此協作，也可能展開協商與爭奪。很多時候，國家都是媒介事件的贊助者，它們因而也會成為紀念活動的組織者，無論是香港回歸還是汶川地震，皆是如此。但民族國家也有可能圍堵或封殺媒介事件的記憶，這反倒有可能激起社會反彈，為民間記憶創造「論述機會」(陳韜文、李立峯, 2010; Lee & Chan, 201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媒介事件的「直播」生產出大量的圖像或影像。所謂「眼見為實」，從集體記憶的角度來說，圖像既是基礎性的紀實載體，也是重要的記憶載具，負載著強大的情感和道德力量(顧錚，2007；Sontag, 1977)。圖像的記憶潛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們的物質形式，正如Zelizer (1998, p. 6)所說，「物質性令視覺記憶有別於其他類型的記憶。圖像有助於將集體記憶的即逝性與波動性固著和錨定於藝術、電影、電視與照片當中……以至於圖像經常成為一個事件的首要標誌。」不過，即便是這些標誌性圖像，也未必總是能夠進入集體記憶(Cohen, Boudana, & Frosh, 2018)。

Sonnevend (2016, p.11) 對柏林牆的個案研究致力於發展出對於「媒介事件的故事如何隨著時間變化、持續或消逝」的「歷時性理解」。她發現，事件與當代議題的相關性、事件所在國家媒介系統的影響力以及不同記憶社群的文化、意識形態差異都有可能形塑「事件在時間、空間和媒介間的旅行」(Sonnevend, 2016, p. 137)。概言之，媒介事件的生命並不會隨著電視直播的結束而終止，而是會在不同的制度、文化和符號場域中延續。只有踏入「記憶」的領地，才能全面理解媒介事件的生成過程，也方能理解事件「躁動不安」和「持續進行」的特質(Wagner-Pacifici, 2017, p. 6)。

在更廣闊的意義上，媒介事件的生成與特定社會或政治結構內的記憶體制緊密關聯。所謂「記憶體制」(Langenbacher, 2003, 2008, 2010a)，是指「圍繞集體記憶的社會意義結構，由話語和權力關係構成，隨著時間變化發展成為制度化的實踐」(Goh, 2013, p. 164)。記憶體制包含兩個維度或元素，一是「歷史腳本」，指支配性的集體記憶，以及相關的歷史教訓、價值和支撐性的倫理和道德話語。二是關乎關鍵事件起因和記憶演變的「宏大敘事」(Goh, 2013; Langenbacher, 2010b)。在記憶體制的形成過程中，國家和黨派發揮重要作用；而特定的記憶體制又會被政治和文化精英當作合法化的力量(Harms, 2017)。

本文以毛澤東追悼會為個案，以影像敘事的生產和再生產為線索，檢視革命年代首屈一指的媒介事件的生命歷程，考察媒介事件興衰存續的文化邏輯，進而把握記憶體制的延續與變遷。本文的出發點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並不是毛澤東追悼會應不應該被遺忘，落腳點也不在於「遺忘」與否，而在於「記憶」與「遺忘」的相互構成。核心問題是，毛澤東追悼會的生產/記憶過程如何臣服於不同時期歷史敘事的邏輯，並具體化為強化與弱化、凸顯與遮蔽等再現的策略和記憶形態。具體的問題包括：(1) 毛澤東追悼會如何經由廣播這一壟斷媒介並與群眾政治相結合形成全國性的媒介事件？(2) 事件的「加冕」腳本由哪些敘事形式和視覺元素構成？在追悼會的早期影像中，浮現出哪些支配性的視覺符號和敘事？(3) 追悼會如何被當代官方影像重新講述？當代腳本與早期腳本之間存在著哪些延續和斷裂？(4) 毛澤東追悼會如何嵌入當代中國記憶體制的歷史腳本和宏大敘事？哪些因素或機制形塑了事件的生命軌跡，並最終導致它在改革年代的消逝？

## 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文的經驗材料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毛澤東逝世的新聞報導和媒介事件的相關經驗材料。鑒於當時播出的廣播和電視節目難以獲得，我一方面收集了各類歷史資料，包括官方文件和回憶文章；另一方面則全面蒐集了《人民日報》對毛澤東逝世的報導，其時限從1976年9月10日延續到1976年10月5日，包括文字報導和新聞圖片，後者構成了媒介事件腳本重要的視覺元素。儘管報紙和廣播電視是不同的媒介形態，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環境下，《人民日報》不僅主導著悼念話語的基本走向，也為廣播電視中的視覺敘事定調。

二是悼念週期內新聞報導之外的紀實圖像、影像資料和文藝作品。包括1976年11月由人民畫報社編輯出版的《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專輯，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新影）攝製並在1976年12月24日上映的紀錄長片《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永垂不朽》），後者片長110分鐘，全景展現了包括天安門追悼會在內的大量追悼活動。除此之外，還包括《美術》雜誌1976年第4期和第5期收錄的十餘幅相關美術作品，以及從<https://chineseposters.net>和各類收藏網站收集的宣傳畫。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三是毛澤東逝世及追悼會的當代圖像/影像，首先是紀念報導或畫冊，《人民日報》歷年在毛澤東誕辰、逝世紀念日刊登的紀念報導包含不少新聞或歷史圖片，但當中幾乎沒有與其逝世相關的圖片。此外，《人民畫報》在1977-2009年間刊登了六個與毛澤東有關的圖片專題，但其中無一收錄與其逝世及追悼會有關的圖片。不過，在三本官方編輯出版的毛澤東畫冊——《紀念毛澤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新華出版社，1986)、《毛澤東畫冊》(中國革命博物館，1993)和《毛澤東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2005)——中，則都包含毛澤東逝世的章節以及相關的歷史圖片。

其次是與毛澤東本人及當代中國有關的紀錄片，它們由新影和中央電視台(CCTV)攝製，代表著官方的影像敘事。如表一所示，多數紀錄片中沒有出現毛澤東逝世及追悼會的畫面，而《毛澤東》、《百年中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圖像日誌》等片則保留了相關影像片段，它們因而構成我們把握當代影像再生產的基本材料。而在官方紀錄片之外，我們也收集了多部由海外廣播電視機構——鳳凰衛視、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日本廣播協會(NHK)等——製作的紀錄片，不過，它們更多構成官方影像的參照，而不是本研究的重心。

表一 紀錄影片中的毛澤東逝世及追悼會影像

序號	片名	時長(分)	上映/播出日期	攝製者	編導	逝世影像
1	毛澤東主席紀念堂	19	1978	新影	高仲明	無
2	毛主席和我們心連心	38	1978.12	新影	王永宏	無
3	毛澤東	75	1983.12	新影	高維進	無
4	《毛澤東》之〈晚年歲月〉	50	1993.12	CCTV	劉效禮	有
5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90	1993.12	新影	李振羽	無
6	《百年中國》第37集〈艱難的抗爭〉	5	2000.1	CCTV	陳曉卿	有
7	走近毛澤東	93	2003.12	新影	艾辛	無
8	《圖像日誌》之〈一代偉人毛澤東〉	10	2009	新影等	趙捷	有
9	《圖像日誌》之〈毛主席紀念堂落成開放〉	10	2009	新影等	趙捷	有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從這些資料的蒐集過程中，我們可以大致窺見毛澤東追悼會在官方影像記憶中的浮沉軌跡。本文從兩個層面對這些資料展開進一步分析：一是對媒介事件的歷史分析，主要依靠官方文件、親歷者追憶、海外紀錄片、《人民日報》報導以及其他影像記錄，重構媒介事件的展演過程。二是對毛澤東逝世及悼念活動的圖像分析，它涵蓋媒介事件的整個生命歷程。首先，我致力於識別出最頻繁、最顯著的圖像或畫面，並分析這些圖像或畫面構成的視覺敘事和媒介事件的腳本。更重要的是，我將對圖像及視覺敘事展開歷時性比較，考察哪些圖像在當代場景下消失、哪些「倖存」下來，進而通過影像的生產與再生產，把握媒介事件及其記憶之間的延續與斷裂。毫無疑問，本文的分析以毛澤東追悼會為核心，但我不會孤立地看待相關的影像。在當代場景下，這些影像多半只是相應作品中的一個片段，一方面需要關照影像文本整體，考察毛澤東逝世的影像如何與其他敘事元素銜接、聯繫，另一方面則要將這種敘事聯繫放在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情境之下詳加考察。

## 構築「電子紀念碑」

毛澤東追悼會帶有強烈的象徵工程意味，其展演遵循從上到下的中央指令，而其接收過程也帶有極強的「集體性」。在悼念週期內，新聞媒體和宣傳工具依靠機械重複、生前身後的敘事結構和從北京到全國再到全世界的悼念地理來為偉大領袖「加冕」，進而構築「電子紀念碑」。在此過程中，「宣誓」這一言語行動生產出最顯著的視覺符號，構造出悼念表演和革命動員的雙重意義空間。

### 作為「象徵工程」的百萬人追悼會

毛澤東於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辭世，當天下午四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台）四套節目、北京電台和北京電視台<sup>1</sup>並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新華社，1976年9月10日b)，宣告了毛澤東的死訊。當晚六點，中央台播出治喪《公告》，明確要求民眾收聽收看追悼大會的實況轉播：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時間下午三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轉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追悼大會的實況，全國各機關、部隊、廠礦、企業、商店、人民公社、學校、街道等一切基層組織，都要組織群眾收聽、收看，進行追悼。全國縣以上地區，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召開有工農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參加的追悼會，先收聽北京追悼大會的實況，然後由本地區黨政軍主要負責人致悼詞。(新華社，1976年9月10日a)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追悼會成為「媒介事件」，並不是儀式組織者與媒體生產者之間協商的結果，而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意志的產物。在非民主國家中，媒介事件的協商往往「只有組織者和觀眾參與其間，生產者通常任由組織者差遣。即便是觀眾，也可能沒有選擇退出或不贊同的自由」(Dayan & Katz, 1992, p. 57)。毛澤東追悼會便是這樣的媒介事件，帶有濃烈的「象徵工程」意味。

毛澤東逝世後，整個國家都停止了跳動，進入悼念時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登出整版遺像，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別刊登《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治喪委員會名單》及《公告》。此後，該報幾乎投入所有的版面紀念毛澤東逝世，一直延續到國慶節。《公告》規定，「從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停止一切娛樂活動」，電影院只能放映悼念毛澤東的新聞紀錄片，中央台停播全部文藝節目，大部分節目停止使用「開始曲」。在9月11至17日弔唁期間，中央台的節目也不斷打破常規，因應當天的情況延長。例如，早間的《新聞與報紙摘要》節目固定時長為30分鐘，但9月10日延長到65分鐘，11日延長到5小時20分鐘，此後維持在四五小時之間(楊正泉，2006a)。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點，天安門廣場舉行百萬人追悼大會。追悼會規模空前，但其儀式程序相當簡單，先是全場默哀，繼而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全程歷時半小時。新華社對追悼會進行了大幅的報導，為我們展現出「媒介事件」的基本輪廓：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下午三時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佈追悼大會開始。全場肅立，百萬人默哀三分鐘，由五百人組成的軍樂團奏起悲壯的哀樂。大會實況通過廣播和電視傳送到千家萬戶。悲壯的哀樂聲傳到祖國城鄉，傳到高山大川，傳到遼闊的邊疆，傳到全國每一個角落。偉大祖國在靜默，八億人民含著眼淚，肅立誌哀。（新華社，1976年9月19日）

「悲壯的哀樂聲」之所以能夠「傳到祖國城鄉」，首先繫於《公告》有關各地收聽/收看追悼會實況的強制規定。其次，當時覆蓋全國的廣電網絡則為之提供了傳播基礎設施。截至1975年底，全國共有電視機46.3萬台，平均每1,600人才擁有一台電視機。相比之下，廣播更為普及，文化大革命期間收音機的社會擁有量逐步增長，有線廣播網基本覆蓋廣大的農村地區（郭鎮之，2016）。無論是在地方追悼會的儀式現場，還是在廠礦機關單位（梅桑榆，2011），全國上下的集體收聽收看場景，構成了媒介事件空間網絡上的節點。在這些場景之外，即便是家庭環境下的接收也帶有強烈的「集體性」。例如，著名作家葉聖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三點，在室內看電視播送之追悼大會實況……與余同觀者，滿子，三午，永和，周湧之母，兀真之姪女五人而已。至善在社中，兀真在天安門前，佳佳在彼校中，阿牛在街道革委會<sup>2</sup>集會之所。追悼會之實況，以廣播及電視播送及於全國，故在此時間中，實為舉國參加追悼也。（葉聖陶，1994：18）

概而言之，與Dayan和Katz描繪的經典的媒介事件接收場景不同，對毛澤東追悼會的主導「觀看」不是發生在「起居室」這樣的家庭空間裡，而是在技術基礎設施和事件組織方式的雙重影響之下，帶有強烈的「集體性」。無論是地方層面的追悼會，還是工礦企業的集體觀看，都讓媒介事件與本地悼念儀式、群眾政治活動結合在一起：普通民眾既是媒介事件的聽（觀）眾，也是儀式的參與者。它們構成了媒介事件的重要一環，在天安門追悼會的宏大儀式之外，製造出無數大大小小的儀式，讓媒介事件的影響力從中央延伸到地方、從政治中心天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安門輻射到不知名的山鄉角落。毛澤東追悼會由此被納入廣場政治的歷史脈絡之中，上承文化大革命中種種狂熱的廣場集會，下啟短短一個月後15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盛大集會慶祝粉碎四人幫，後者構成了自上而下的廣場政治的尾聲。

### 為「偉大領袖」加冕

通過廣播電視直播的百萬人追悼會，構成了狹義的媒介事件。天安門廣場上歷時半小時的國家儀式結束了，但對毛澤東的悼念遠遠沒有劃上休止符，它們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擴展的媒介事件。從1976年9月10日開始，全國上下主動或被動地沉浸在由電視機、收音機和「大喇叭」協力構造的悼念時空裡。一直到10月初，中央台的悼念宣傳才宣告結束，各類節目恢復使用開始曲，文藝節目也基本恢復(楊正泉，2006b)。

悼念的目的是加冕，而加冕本質上即是記憶工作。在追悼會空前的規模之外，媒體和宣傳工具依靠三種敘事策略為「偉大領袖」加冕。一是機械的重複。僅在9月18日當天，追悼大會的實況就播出了11次，文字消息播出5次、單獨播出悼詞11次、《東方紅》及《國際歌》11次。之後，大會實況連續播出三天，總計播出20次，而悼詞則連續播出到25日(楊正泉，2009)。此外，由官方媒體生產的視覺元素也在不同的渠道中不斷地流通與再生產，並延伸到《人民畫報》的紀念專輯和新影攝製的紀錄片中。《人民畫報》的紀念特刊在64頁的篇幅內刊登了136幅圖片，絕大多數選自《人民日報》此前的圖文報導。這顯示出，當時對毛澤東的紀念乃至再書寫處在高度受限的話語場域內，延續著媒介事件中由國家自上而下的種種安排。此外，綿延數月的「重複」也凸顯出悼念的規格，彰顯毛至高無上的地位。

二是身後加生前的敘事結構。《人民畫報》整本專輯前半聚焦「身後」，計24頁、67幅圖片；後半聚焦「生前」，計40頁、69幅圖片。生前身後圖片數量相當，但從篇幅來看，「生前」比「身後」更為重要。《永垂不朽》紀錄影片的前半段都是毛澤東逝後的影像，基本上以時間為順序，從弔唁持續到追悼會。影片最後七分鐘則是毛澤東「生前」的影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像，從篇幅來看，這一部分遠遠短於「身後」。但正是在這七分鐘裡，加冕的影像儀式被推到高潮：「影片最鼓舞人心的場面，是一九四九年開國大典和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的有歷史意義的鏡頭和實況錄音……影片結尾，一輪紅日噴薄而出，象徵著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永遠不落的紅太陽」（新華社，1976年12月23日）。概言之，「身後」和「生前」二者相互強化：逝世成為追念生前成就的契機，而生前成就則讓身後的高規格悼念顯得理所應當。

三是從北京到全國再到全世界的悼念地理。對於《人民日報》和中央台的早期報導而言，這種悼念地理的擴展是按照時間先後自然展開的。例如，《人民日報》1976年9月19日的報導集中在天安門廣場的百萬人追悼會和北京的追悼活動；9月20至22日的報導擴展到全國，而9月27至28日則分別呈現亞非拉歐美等國的悼念活動，儘管這些活動多半發生在追悼會之前。《人民畫報》的專輯以版面上的先後次序再生產了這一悼念地理，其中，首都北京佔據著最為核心的位置。同樣地，在前期弔唁階段，《永垂不朽》也以影像先後順序建構出從北京到全國再到全世界的悼念地理。其中，北京的悼念活動以人民大會堂瞻仰遺容為核心，而紀錄片呈現的全國悼念活動則表現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是與《人民畫報》專輯類似的自然地理概念，從天山腳下到世界屋脊，從內蒙牧場到雲南邊疆；第二層則既是「革命」歷史地理、也是毛澤東個人的革命歷程，聚焦一系列的革命聖地，涵蓋韶山毛澤東舊居、中共一大會址、井岡山、江西瑞金、貴州遵義、陝西延安等。在如是建構的悼念地理之下，毛澤東不僅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更是「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新華社，1976年9月10日b）。

## 「宣誓」：從悼念表演到革命動員

對於毛澤東的逝後加冕禮而言，億萬民眾不僅是收音機（電視機）前的聽眾（觀眾），更是媒介事件的「演員」。他們需要以各種言語行動來表達「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化悲痛為力量」的決心，而這種表達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58 期（2021）

成了媒介事件加冕腳本的另一個重要維度。在悼念週期內，《人民日報》和中央台不停刊登或播發各類政治「表態」，但與之相比，更強大的媒介事件腳本載體是「宣誓」這一言語行動。在《人民畫報》呈現的悼念圖像中，「宣誓」是重要的視覺元素。特刊共刊登七張宣誓圖片，其中六張為中景或近景舉拳宣誓動作。不過，與靜態的新聞圖片相比，紀錄片《永垂不朽》中對「宣誓」片段的呈現更為豐富、生動。在六十餘分鐘的弔唁活動影像中，宣誓段落只佔了五分鐘，但卻無疑是這部分的敘事高潮。

《永垂不朽》的宣誓段落出現了大量的原聲，而不像其他部分更多是無聲畫面、配樂和解說相結合。這當中包括四組集體宣誓的畫面，先後是首都工人、農民、軍人和紅衛兵，<sup>3</sup>用以代表當時最重要的社會階級和群體。這些宣誓是高度儀式化的行動：由一兩人站在隊列前舉拳朗讀誓詞，其餘人列隊舉拳做宣誓動作。此外，宣誓的誓詞也遵循著相似的模板。以最先登場的工人為例（參見圖一、二），身穿「針織總廠」工裝的領誓者大聲朗讀「敬愛的毛主席，戰鬥在您身邊的首都工人階級向您莊嚴宣誓：我們一定化悲痛為力量……把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與此同時，畫面掃過其他宣誓者，人群中傳來響亮的哭聲。在整段宣誓過程中，領誓者處在影像的中心，她宣誓的聲音響亮，但當中夾雜著哽咽，面部則流露出極度悲痛的表情。握緊舉起的拳頭、哭泣的面龐和響亮的誓言三位一體，共同構成了「宣誓」的核心要素，令其成為弔唁過程中儀式化色彩最重、意義最為豐富的悼念表演。

圖一、二 首都工人在瞻仰毛澤東遺體時宣誓



圖片來源：紀錄片《永垂不朽》截圖，使用獲得新影集團授權許可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在追悼會「東方紅」樂曲終了之後，片中再度出現了一組與「宣誓」有關的影像，構成了宣誓敘事的重要轉折。開場畫面即是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戰鬥英雄冷鵬飛在高炮團帶領官兵宣誓，其靜態場景被攝影記者李振盛(2018)拍攝下來(圖三)，並刊登於《人民日報》1976年9月21日頭版。與弔唁期間的宣誓不同的是，紀錄片在這裡不再出現宣誓的「原聲」，解說員以「解說詞」形式代替廣大民眾進行宣誓。除此之外，這一段的宣誓與上一節存在著鮮明的不同。首先，出現在畫面中的無論是士兵還是農民、是紡織女工還是少數民族群眾，臉上都不再有痛哭的表情，代之以冷靜堅定，而解說詞也相應地以「擦乾眼淚，舉起鐵拳，心向北京，莊嚴宣誓」開篇。其次，宣誓的對象仍然是毛主席，但卻不是面對靈堂中的「遺體」，而是政治中心的「北京」；更重要的是，效忠對象從毛澤東自然延伸或遷移到繼任者身上，誓詞變成「毛主席，我們一定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一切聽從黨中央的號令」。可見，這一段宣誓有著更為強烈的現實指向或效用，意在借助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來強化「接班人」的政治權威、合理化當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訴求。隨著毛澤東悼念活動邁向尾聲，「宣誓」這一言語行動的重心也從「悼念表演」轉向了「革命動員」。

圖三 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戰鬥英雄帶領高炮團官兵宣誓



圖片來源：李振盛《紅色新聞兵》，使用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許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宣誓」不僅出現在各類紀實影像中，也出現在視覺藝術中，由此從「悼念表演」轉化為「標誌性符號」。宣傳畫堪稱「社會主義視覺文化的標準藍本」（唐小兵，2018：33），圖四、五這兩幅畫，沿襲宣傳畫常規和傳統（王宇清，2014）。它們均以「克隆的藝術」（Pang, 2017）來刻畫「宣誓」這一言語行動：第一，與寫實的影像只能聚焦單一群眾不同，宣傳畫將工農兵形象並置在一起。畫面主體工農兵人物採用金字塔構圖，頂天立地，凸顯出畫面的穩定和力量；第二，工農兵身後隱然可見宣誓的群眾，既強化工農兵的政治地位，也帶出億萬民眾；第三，在對宣誓動作的刻畫上，宣誓人不再像紀實影像中那樣平視前方，而是取仰視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宣誓人不再哭泣或哀傷，神情鎮定堅毅，充溢著「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的決心。概言之，這些宣傳畫跳出寫實的束縛，凝聚和昇華了「擦乾眼淚，舉起鐵拳」這一主題。儘管圖三背景中的天安門廣場、宣誓人左臂的黑紗胸前的黃花、圖四的毛澤東頭像和松柏意象讓宣誓仍帶有鮮明的「哀悼」意味，但它也帶有強烈的「動員」色彩，言語行動的重心也從「悲痛」轉移到「力量」上。

圖四、五 「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宣傳畫<sup>4</sup>



圖片來源：The IISH / Stefan R. Landsberger / Private Collection

在文本層面的視覺元素之外，宣傳畫的物質性同樣值得關注。以圖四為例。這幅畫由尹戎生等繪製，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1976年9月一版一刷的印數達四萬。可以想見，它們曾被廣泛張貼在城市和鄉村的公共和家居空間。四十年過後，它們轉而成為各類收藏網站上待價而沽的文化大革命「藏品」。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 「電子紀念碑」的消逝

毛澤東追悼會這座「電子紀念碑」剛剛被構築起來，便遭到第一輪「風蝕」：四人幫被打倒之後，他們的圖像被從媒介事件的再現中強制擦除。在之後的數十年間，華國鋒的影像消失，而「宣誓」等標誌性符號以及背後的「繼續革命」腳本也走向瓦解。在默哀和哭泣等殘存的影像中，毛澤東的逝後加冕禮不再是「全民癡狂」的國家儀式，而是被重構為中國走出低谷的轉折點。

### 消失的「四人幫」

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高層政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四人幫」於1976年10月遭拘捕，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人民畫報》紀念專輯和紀錄影片《永垂不朽》先後面世於1976年11月和12月。彼時，人們或許仍然對四人幫站在追悼會紅色高台之上的情景記憶猶新，但如今，它們卻成為紀念專輯和紀錄片中亟待處置的視覺「麻煩」。因此，畫報專輯和紀錄片不僅以復刻《人民日報》和中央台的方式再生產「紀實」影像、參與構築電子紀念碑，亦同時展開對媒介事件最早的記憶書寫。

因應當前的政治形勢對歷史事件的視覺呈現作出修正並非始自毛澤東逝世，相反，它在前蘇聯和中國都有著悠久的歷史 (Hung, 2007; Perry, 2012)。周恩來逝世紀錄片的攝製即不斷遭到政治干預 (高維進, 2013; 陳播, 2005; 竇春起, 2007)，而毛澤東的追悼會自然也成了中共高層爭奪歷史遺產及合法性的符號戰場，對影像的操縱貫穿了媒介事件的展演過程。根據「紅牆攝影師」(張中江, 2014) 杜修賢的回憶，他對追悼活動的拍攝受到諸多干預和擺佈，包括在「四人幫」指令下拍攝毛澤東遺體前的「八人照」，應「輿論總管」姚文元要求突出江青守靈的鏡頭等 (杜修賢, 1997)。這些干預也延伸到《永垂不朽》的攝製過程中，攝製組被「『四人幫』在文化部的親信」要求「拉長王張江姚的鏡頭，對大野心家江青的花圈，要『詳細的表現』，要有『分解』，要著力宣傳江青及其獨出心裁的所謂『花園改革』」(新影批判組, 197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然而，四人幫的倒台讓整個情勢翻轉過來，其結果便是，紀錄影片中原本必定會出現的「王張江姚的鏡頭」被清除殆盡。對照此前的《人民日報》報導，我們可以推斷，倘若四人幫沒有被打倒，他們的身影至少會出現在如下的影像場景中：1976年9月11至17日在靈堂瞻仰遺體、守靈、接見前來弔唁的外國領導人、9月18日追悼會上為毛澤東敬獻花圈、主持追悼大會、列隊站在主席台上默哀、鞠躬等。此外，即便是上映版本仍然看得到明顯的「斧鑿」痕跡。例如，在追悼大會上，王洪文就站在華國鋒身旁，為了避免王與華同框，紀錄片呈現的致悼詞畫面要麼就是廣場全景，要麼就是華國鋒特寫，只有葉劍英出現在華國鋒另一側。

與紀錄影片相比，《人民畫報》紀念專輯抹除四人幫的操作更為直白顯豁。多數文字報導直接將涉及到四人幫的敘述刪除，例如將新華社電文「下午三時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佈追悼大會開始」改為「下午三時整，追悼大會開始」。其他一些報導則通過「打叉」來抹掉四人幫。例如，「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宋慶齡、××、×××、李先念……瞻仰毛主席的遺容，向毛主席三鞠躬，默哀三分鐘」（人民畫報社，1976年11月：10）。對照《人民日報》報導（新華社，1976年9月12日），文中被以「×」符號代替的人物分別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使用表達否定含義的「×」別有意味，一方面直接遮蔽了當事人的姓名，另一方面也產生「去合法化」作用，讓讀者在看到這些符號時，聯想到四人幫已經被打入另冊，政治上無法翻身。

與文字的刪改相比，圖像的處理在技術層面更為複雜。不過，擺拍、剪輯拼接及圖像再加工等技術手段和做法在當時的新聞攝影界相當普遍（晉永權，2009）。為了在視覺上清除四人幫，《人民畫報》刻意選擇場景相同但不存在四人幫成員的圖片。以華國鋒在追悼會上致悼詞為例，《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9日a）刊登的是「五人照」，<sup>5</sup>圖中除了正在致辭的華國鋒之外，還包括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和江青。而《人民畫報》（1976：13）則直接捨棄了這張照片，選擇了「兩人照」，畫面中只保留了華國鋒和他身旁的葉劍英，其構圖方式與紀錄影片中的相關影像非常相似。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新聞圖片都可以找到備選項，在這些情況下，專輯採取了各種技術性的剪裁和拼接手段。其中最簡單的是對圖片進行切割或裁剪，將四人幫成員從圖片中剪掉。例如，《人民畫報》(1976年11月：10)將一幅原刊《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5日)的橫幅照片從中剪開，截取了右半邊華國鋒與參加弔唁的外國友人握手的場景，原本處在畫面中央的華國鋒移到了畫面最左邊，而他左側<sup>6</sup>(身後)的王洪文、葉劍英及其他領導人則被悉數抹去。這只是對照片局部的截取，不會留下任何剪裁痕跡。同一頁另外一幅類似主題的照片，則將原刊於《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4日)的照片中站在華國鋒身後的王洪文和張春橋摳掉，再將陳錫聯、汪東興等移到華國鋒身旁。剪裁導致華國鋒的右手懸在空中，而沒有像原圖中那樣與被接見女士的手握在一起。

不過，這只是細小的視覺瑕疵，並不容易被發現。而對於那些無法局部截取的新聞圖片，《人民畫報》採用了更簡單粗暴的做法，即直接將四人幫成員從圖片中「摳掉」，不對照片其餘部分做任何處理，由此造成了視覺上的「空洞」和「奇觀」。其中一例的場景是領導人在毛澤東遺體前肅立瞻仰遺容(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2日)，《人民畫報》(1976年11月：4-5)保留了畫面場景，但摳掉了宋慶齡左側的姚文元，以及華國鋒右側的王洪文、張春橋和江青。摳掉之後，由於無法壓縮圖片或填充任何人物，只能「留白」，造成了視覺上的「黑洞」。

這種視覺上的「空洞」在另一幅原刊《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9日b)的圖片中表現得更為顯豁，該圖呈現的是天安門廣場追悼會上領導人與群眾一起默哀的場景。《人民畫報》(1976年11月：12-13)將原來立於華國鋒左側的王洪文、張春橋和江青和宋慶齡右側的姚文元悉數摳除。領導人隊列不可能填充任何人物，而廣場上的群眾方陣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矗立的巨幅黑色輓幛又導致畫面無法壓縮，照片中就只能留下一左一右、一大一小兩處空隙，它們在室外光線下顯得格外扎眼。當然，這兩例採取的激進處理手法，只能是對集體照「不得已而為之」的修改。由於圖片中存在著難以彌合的視覺「漏洞」，它們雖然在打倒四人幫的背景之下在國家級的畫報上刊登出來，卻沒有辦法傳之於後世，而是注定成為消逝的圖像。四人幫在圖像、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歷史場景乃至視覺記憶中的消失，成為毛澤東追悼會記憶糾葛的開端；加之紀錄電影為之後的影像再生產提供了原始素材，這一切也為之後數十年媒介事件的「消逝」埋下了伏筆。

### 百萬人追悼會的消逝

在1976年的《人民畫報》紀念專輯和紀錄片《永垂不朽》當中，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華國鋒都處在顯赫的視覺位置上，這延續到紀錄片《毛澤東主席紀念堂》(高仲明, 1978)中。但隨著華國鋒淡出高層政治舞台，這位過渡性人物也在毛澤東追悼會的影像中「淡出」了。在表一所列的當代紀錄片中，我們不僅看不到他在追悼會上致悼詞的影像，連在弔唁等場景下的影像也被悉數刪除。

以《共和國圖像日誌》之〈毛主席紀念堂落成開放〉(趙捷, 2009)為例，其中有關領導人弔唁的影像直接取自《永垂不朽》，但做了進一步的處理：

靈堂場景(毛澤東遺體及守衛士兵和背後花園)——華國鋒、葉劍英特寫——李先念、陳錫聯等領導人步入靈堂——毛澤東遺體——華國鋒、葉劍英、宋慶齡、李先念等特寫。(《永垂不朽》，1976)

靈堂場景(毛澤東遺體及守衛士兵和背後花園)——□□□□□□□□□□——李先念、陳錫聯等領導人步入靈堂——毛澤東遺體——□□□葉劍英□□□□□□□□特寫。(〈毛主席紀念堂落成開放〉, 2009)

兩相對照，《永垂不朽》中葉劍英之後多名國家領導人的特寫之所以在2009年的紀錄片中被刪掉，大概是篇幅上的考慮；但華國鋒的兩處特寫都被刪掉，則更多是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考量。在對四人幫的分析中，我們已經指出，影像並不能像文字那樣可以隨意篡改和操弄。吊詭的是，這也令我們在某些影像記錄中看到了「殘餘」的華國鋒形象。例如，紀錄片《百年中國》在講到四人幫被打倒的時候，就出現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了下面這一組畫面：畫面一：粉碎四人幫慶祝集會，天安門城樓上葉劍英近景、華國鋒中景、李先念遠景；畫面二：面對集會人群，葉劍英（左）與華國鋒（右）交談的背影；畫面三：領導人面對集會人群的背影，左二葉劍英、左三華國鋒、右二李先念；畫面四：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半身特寫。這裡之所以出現華國鋒，並不是編導的疏忽或刻意為之，而是因為他與其他領導人在一起的圖像無法剪切。因為，單獨的半身特寫中並沒有他，而對應的解說詞也只提到「在天安門城樓上，人們看到了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一批老同志的身影」。當然，華國鋒並不是僅從毛澤東追悼會的影像中消失，而是從官方主導的當代記憶體制中消失了。

隨著四人幫和華國鋒被剪除，追悼會這一場國家儀式便只剩下了「觀眾」，但與觀眾有關的一個重要視覺元素也在當代影像中消失了，那就是「宣誓」。在表一所列的所有紀實影像中，只有一部出現了「宣誓」畫面。在紀錄電影《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李振羽，1993）結尾處，一群少年兒童在毛主席紀念堂面對著毛澤東塑像敬少先隊禮，<sup>7</sup>童聲畫外音響起，「我們向您宣誓，要牢記您的教導……我們永遠懷念您，懷——念——您！」不過，這裡的宣誓無論是在言語行動還是符號意義都與上文分析的「宣誓」活動相去甚遠。很明顯，這一帶有濃烈的「繼續革命」色彩的視覺符號在改革年代變得「不合時宜」。

當代仍然流通的追悼會影像，多半都是群眾默哀或痛哭的畫面。例如，1986、1993和2005年官方出版的三本毛澤東畫冊，都收錄了天安門廣場追悼會的全景，而後兩本則均收錄了紡織女工痛哭著向毛澤東遺體告別的畫面。1993年12月，中央電視台播出12集電視紀錄片《毛澤東》（劉效禮，1993），最後一集〈晚年歲月〉在「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毛澤東與世長辭……」的字幕後播放了一分鐘的逝後畫面。畫面以「默哀」為主軸，除了背景音樂之外，沒有一句解說詞。共和國圖像日誌〈毛主席紀念堂落成開放〉用了近兩分鐘來描繪毛澤東的逝世，涵蓋了從9月9日到9月18日的重要歷史場景。從對媒介事件的呈現上來看，圖像日誌大量運用群眾默哀的畫面，它們基本上都來自《永垂不朽》中追悼會開始的三分鐘默哀，大致呈現了從北京到全國的悼念地理。在對逝世和追悼會的呈現中，默哀是一種尋常的畫面，不會傳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遞出較為強烈的情感。相比之下，紀錄片《百年中國》的畫面更為強烈。除了一般性的紀實畫面——遺像、追悼會現場、領導人特寫——之外，該片運用了兩組普通民眾痛哭的特寫鏡頭來表現全國哀悼的場景和氛圍，它們均取自紀錄片《永垂不朽》開場片段。

與1976年的宣誓等激進影像相比，三十多年後的默哀和痛哭畫面更多回到「追悼」的自然反應。有趣的是，在悼念這一層自然意義之外，普通民眾的痛哭還被賦予了更深層的意義。在毛澤東追悼會片段尾聲，《百年中國》的解說詞寫道：

1976年的中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人們在痛哭，他們不僅為偉人辭世而痛哭，更為祖國和民族的前途擔憂。而此時，世界各國都紛紛關注著中國局勢的變化。在經過一個月的沉寂之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在這個金秋的十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宣告結束，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陳曉卿，2000)

這一段對痛哭的闡釋饒有意味。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整體敘事上的過渡和銜接，上承周恩來、朱德逝世和唐山大地震，下啟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但另一方面，這也為影像引入了替代性的解釋，即痛哭既可以是「悲傷」，也可以是「迷茫」。不過，如是解釋也可能削弱毛澤東追悼會獨一無二的「崇高」性質，將它與轉折年代的其他事件並置起來。無論如何，毛澤東的逝世及其追悼會不再是自成一體的「國家儀式」，而是更多作為1971至1976年「艱難的抗爭」(該集標題)的一部分，被看作中共執政走出低谷的轉折點。

## 結論與討論

在改革年代，作為開國領導人的毛澤東並沒有被遺忘，但他的追悼會卻在官方影像記憶中消逝了。這座電子紀念碑之所以沒有能夠長久矗立，並不是自然侵蝕風化的結果，而是受到政治和文化雙重機制的影響。所謂政治因素，是指中共高層政治變動導致的追悼會影像的政治不正確性。具體來說，早在1976年底，毛澤東逝世不過兩個月之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際，紀錄片《永垂不朽》和《人民畫報》的紀念專輯就因應打倒四人幫的背景，將四人幫從「偉大領袖」的葬禮中擦除，以免他們玷污領袖「加冕」禮的純潔性。改革年代華國鋒的消失，遵循著同樣的視覺政治邏輯，在這一點上，我們能夠捕捉到革命年代和改革年代吊詭的延續性。

然而，視覺記憶在一定程度上會抗拒強制性的「遺忘」或「擦除」，這既與圖／影像的技術與文本特徵有關，也牽涉到其物質性。首先，想要通過視覺文本的局部改寫來扭曲記憶，遠比文字更為困難。四人幫被剔除後留下的「黑洞」以及殘存的華國鋒形象，都說明了這一點。其次，儘管「宣誓」圖像在改革年代不再流通，但當年曾經大規模印刷的宣傳畫卻並沒有悉數消失。只不過，它們從家居空間的牆壁或公共空間的張貼欄，幾經輾轉，變成供收藏者交換的收藏品；而宣傳畫的價值也在「革命懷舊」的潮流之下被重估。

四人幫和華國鋒的消失，導致追悼會致辭部分的影像及主席台的影像無法再出現，但這並不會導致媒介事件的徹底消逝。因為除此之外，事件中還有大量可供調用的視覺素材。在這裡，文化機制對集體記憶的消長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Lee & Yang, 2007, p. 11)。這牽涉到媒介事件的影像再生產與主流政治文化的契合度，以及它是否能夠在潛在的受眾群體中喚起共鳴 (Armstrong & Cragg, 2006)。這種「共鳴」涵蓋一正一反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毛澤東追悼會的影像再生產過程中，1993年是一個分水嶺：追悼會影像此前徹底消失，此後一定程度上回歸。1993年是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官方舉行了高規格的紀念活動，民間也掀起了對毛本人和毛時代的懷舊熱潮 (戴錦華, 1999; 吳靖, 2012; Barmé, 1996, 1999; Hubbert, 2006; Wu, 2006)。毛澤東追悼會在1993年之後的「回歸」，呼應著當代對毛的紀念文化的軌跡，成為後者在紀實影像中的回響。但另一方面，這種回歸只是局部的、有限度的回歸。如前所述，在改革年代殘存的追悼會影像中，「宣誓」這一標誌性符號消失了，消失得比華國鋒的影像還要徹底。這意味著，在革命年代尾聲形成的媒介事件腳本在改革年代顯得不合時宜，它既不契合官方的紀念基調，也不大可能喚起民間的共鳴，最終只能瓦解為以「默哀」或「哭泣」等視覺元素構成的碎片化影像敘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政治意識形態考量與政治文化邏輯合而觀之，折射出的正是當代中國記憶體制的變遷過程。在毛澤東逝世之際，無論是媒介事件的展演還是電子紀念碑的構築，都從圍繞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記憶體制中汲取資源，同時進一步強化這一體制。在該記憶體制中，毛澤東紀念的歷史腳本是由《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新華社，1976年9月10日b)寫就的：支配記憶是毛主席作為全黨、全軍和共和國的「締造者和英明領袖」，歷史「經驗」是忠於毛主席，背後的價值和倫理話語則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化悲痛為力量」。從宏大敘事的角度來說，對毛澤東的紀念基本上靠政治意識形態設施經由高度受控的宣傳機構推動，它既是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頂峰的個人崇拜的自然延續，也是繼任者試圖依靠毛澤東的政治遺產獲得合法性的動員過程。

而當代場景下展開的毛澤東逝世及追悼會的影像再生產，則處在一個新的記憶體制之下。該體制更多圍繞中共展開，歷史腳本中的支配記憶以百年近代史為依託，強調中共帶領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解放和富強，歷史「經驗」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價值和倫理話語則落腳在過去的歷史成就賦予中共以合法性。從宏大敘事的角度來說，這套集體記憶由政治意識形態設施聯合商業化的傳媒推動，而毛澤東追悼會的媒介事件則很難嵌入這套記憶體制。一方面，沿襲著1981年6月1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81)中的評價，毛澤東「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官方記憶更強調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的)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81)，弱化他晚年的錯誤。受此影響，官方的紀念——以及擴展開來的主流媒體紀實影像——將重心更多放在其前半生，較為漠視其後半生。另一方面，當代記憶體制傾向於強化成就、弱化波折，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影像創作者寧可選擇普通民眾默哀、流淚的場景，而不會選擇「宣誓」這類帶有強烈文化大革命色彩的畫面，或是紅衛兵這樣的人物形象。毛澤東追悼會的影像，因而有可能同文化大革命乃至大躍進的影像一起被剝離掉；最高領袖的逝後加冕禮也不再是「全民癡狂」的國家儀式，而是被重構為中共以及中國走出低谷的轉折點。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在毛澤東追悼會媒介事件的展演——電子紀念碑的構築——過程中，我們看到前一個記憶體制的運作；而後一個記憶體制則導向了電子紀念碑的消逝。前後兩個記憶體制之間當然存在著斷裂，但決不是說二者之間毫無共同點，恰恰相反，歷史腳本和宏大敘事或有變化，但通過意識形態設施展開政治強制的邏輯則一以貫之。記憶體制的延續和斷裂，生動地體現在四人幫和華國鋒在影像記憶中的命運：前者從「偉大領袖」的葬禮中剔除，是為了避免玷污領袖「加冕」禮的純潔性；後者的強制性擦除，則更多是為了建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平緩」歷史敘事。

毫無疑問，第二個記憶體制目前仍然處在主導地位，持續主導著影像再生產和集體記憶的建構，但這並不是說，它沒有遭到任何挑戰。實際上，來自民間的另類敘事或「反記憶」，直接挑戰媒介事件的正統敘事和官方記憶，其核心腳本是對毛澤東的「祛魅」。著名畫家陳丹青曾在1976年創作油畫《淚水灑滿豐收田》，描繪西藏農牧民從廣播中收聽到毛澤東逝世噩耗的情景。三十多年後，他在香港出版的《七十年代》中，憶述1976年9月9日得知毛澤東死訊時的情景：

拉薩陽光猛烈，我記得屋裡的靜，三個人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猝不及防，笑出來……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此後我不再目擊千百人顛仆號叫的壯觀。葬禮中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畫成的大油畫便是一組痛哭的臉。這萬民痛苦的理由，是大悲痛、大憂患、大解脫，或者，僅只因為恐懼，因恐懼而趁勢放聲一哭。（陳丹青，2008：47-48）

「嘴角的痙攣」、難掩的笑意和「恐懼」都將「痛哭」顛覆，也將媒介事件的嚴肅與崇高消解殆盡。因此，在簡體字版《七十年代》（陳丹青，2009）中，「只怕猝不及防，笑出來」中的「笑出來」被刪掉，而「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則被改為「但找不到準確的詞」。這說明，這類「反記憶」觸碰到了歷史禁忌，在主流話語空間中仍然受到壓制，暗流湧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與這類激進記憶相比，以民間懷舊為依託的記憶大體上與官方立場合流，但其中也蘊含著挑戰主導歷史腳本和宏大敘事的可能性。例如，在各類大眾讀物或網絡追憶文章中，我們能夠看到華國鋒致悼詞的圖像、四人幫的身影，或者被截取的「宣誓」宣傳畫，<sup>8</sup>以碎片化的方式「還原」著歷史的真相。例如，紀念網站「毛澤東博覽」(<http://www.mzdbl.cn>)收集了大量影音資料，包括紀錄片《永垂不朽》。不過，其內容卻與前文分析的公映版有所不同：網站運用視頻剪輯手段將消失了的四人幫影像「還原」了出來。比如，追悼會的開場出現了王洪文主持儀式的畫面和解說詞，只不過其拼接相當生硬粗糙。在被問及為何要剪接上映的紀錄片時，網站負責人解釋道：

毛主席的追悼大會如果「四人幫」沒有參加，就不該有他們的鏡頭。但是他們參加大會，當然要有他們的鏡頭。否則就是篡改歷史了。當時出版的報刊都有，是真實的歷史紀錄。後來出版的畫報把那幾個人從畫面上摳掉，與事實不符。毛澤東博覽盡量把真實的歷史向公眾展示。<sup>9</sup>

毛澤東追悼會的真實面貌，就這樣棲居在互聯網的一個小小角落。無論這一段解釋是「篡改」紀錄片的真實原因還是正當化其做法的託辭，它都在官方記憶體制之外拓展出另類記憶空間，也帶出了有關中國革命的歷史與記憶、官方與民間乃至激進與保守等一系列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值得後續研究細細考察。

跳出毛澤東追悼會個案，本研究對於理解媒介事件及其公共記憶等一般性的理論議題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啟示。其一，在理論層面，媒介事件的盛大演出並不會讓它們自然而然地變成「電子紀念碑」。它們是否會經由影像的生產與再生產進入當代的集體記憶，取決於媒介事件腳本與更廣闊的社會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歷史敘事邏輯之間的契合度。在此過程中，無論是記憶還是遺忘，都未必是與事件的斷裂，而是媒介事件展演邏輯的自然延續；原本濃縮整個社會價值觀的整合性媒介事件也有可能漫長的生命歷程中邁向分化。

其二，對媒介事件的探討不能以直播結束為休止符，更不能將「事件」和「記憶」割裂開來，而應該納入整體性的事件視野，將事件的生命

##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史視為動態的過程。這首先牽涉到方法論層面的考量，以毛澤東追悼會為例，我們其實很難準確指出事件在哪裡結束、記憶在哪裡開始。畢竟，1976年底上映的紀錄電影《永垂不朽》既參與了構築電子紀念碑，也因為剔除四人幫而成為紀念碑消逝的源頭。更重要的是，它也牽涉到在理論層面擴展媒介事件的邊界，跳脫狹隘的「事後」記憶概念，將媒介事件的生產視為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由此考察並把握特定事件的生產/記憶過程如何臣服、遵從當下歷史敘事的邏輯，並成為其一部分。

其三，如前所述，不同時期的記憶體制形塑了毛澤東追悼會的沉浮軌跡，但它不僅僅局限於毛澤東追悼會，而是指向更為宏大的集體記憶的意義結構。該分析框架因而可以從毛澤東追悼會擴展到眾多當代歷史事件，包括天安門事件、香港回歸乃至汶川大地震。哪怕是本文開篇與毛澤東追悼會並舉的「十里長街送總理」，也可以放到記憶體制的更替中解釋，因為「人民愛戴的好總理」契合當代的記憶體制，而「當年送您的十里長街，如今已是十里繁華」更將「復興」敘事帶入歷史腳本。運用記憶體制概念對這些事件展開分析，有助於我們把握它們的生成邏輯；而對這些個案的深入探究或比較分析，則能夠深化我們對當代中國記憶體制及其運作機制的理解。

## 註釋

- 1 中央電視台前身，於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1978年5月1日更名為「中央電視台」。
- 2 「革委會」是革命委員會的簡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各級政權的組織形式。
- 3 「紅衛兵」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澤東在1966年和1967年發動和引導的大規模準軍事學生運動和由此形成的組織及其成員，最早的紅衛兵組織於1966年5月底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
- 4 圖三：<https://chinese posters.net/posters/g2-679.php>，圖四：<https://chinese posters.net/posters/pc-1976-l-001.php>。
- 5 受制於中國大陸有關領導人歷史圖片使用的嚴苛規定，本文作者無法購買或獲得本節所有圖片的版權許可，只能以文字描述圖片內容，特此向讀者致歉。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 6 這裡的左側右側是按照讀者的視線方向，而非圖片中人物的視線方向，下同。
- 7 「少先隊」，即中國少年先鋒隊，是中國少年兒童的群眾組織。少先隊隊禮是右手五指併攏，高舉過頭約一拳的距離。
- 8 參見紀念網站「毛澤東博覽」(<http://www.mzdbl.cn>)的首頁題圖。
- 9 與網站開設的微信公眾號「紅色年代」負責人的私人交流，2018年8月22日。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人民畫報社 (1976年11月)。〈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人民畫報》，第11期。
- Renmin huabaoshe (1976, November). Weida de lingxiu he daoshi Mao Zedong zhuxi yongchui buxiu. *Renmin huabao*, 11.
-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 (2018年9月9日)。〈42年前的今天，毛主席逝世〉。取自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2803301701/GyvPsvh4k>。
- Renmin ribao guanfang weibo (2018, September 9). 42 nian qian de jintian, Mao zhuxi shishi. *Xinlang weibo*. Retrieved from <https://weibo.com/2803301701/GyvPsvh4k>.
-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 (2019年1月8日)。〈今天，發條微博，緬懷周總理〉。取自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2803301701/HaWJvldjV>。
- Renmin ribao guanfang weibo (2019, January 8). Jintian, fatiao weibo, mianhuai Zhou zongli. *Xinlang weibo*. Retrieved from <https://weibo.com/2803301701/HaWJvldjV>.
- 人民網 (2019年1月8日)。〈那年十里長街人群悲慟，只為送您！〉。取自人民網微信公眾號。
- Renmin wang (2019, January 8). Nanian shili changjie renqun beitung, zhiwei song nin! *Renmin wang weixin gongzhonghao*.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81)。《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
-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ongyang weiyuanhui (1981). *Guanyu jianguo yilai dang de ruogan lishi wenti de jueyi*.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 (1986)。《紀念毛澤東》。北京：文物出版社。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 Zhongguo geming bowuguan (Ed.). (1986). *Jinian Mao Zedong*. Beijing: Wenwu chubanshe.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新華出版社編 (1993)。《毛澤東畫冊》。北京：新華出版社。
-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Mao Zedong yanjiuzu, Xinhua chubanshe (Eds.). (1993). *Mao Zedong huace*.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編著 (2005)。《毛澤東畫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Mao Zedong yanjiuzu (Ed.). (2005). *Mao Zedong huazhuan*.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丹尼爾·戴揚、邱林川、陳韜文 (2009)。〈「媒介事件」概念的演變〉。《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頁1-17。
- Dannier Daiyang, Qiu Linchuan, Chen Taowen (2009). “Meijie shijian” gainian de yanbi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1-17.
- 王宇清 (2014)。《張彩貼紅：1915-1976美術張貼與現代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Wang Yuqing (2014). *Zhangcai tiehong: 1915-1976 meishu zhangtie yu xiandai Zhongguo*. Beijing: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 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 (2018年9月9日)。〈今天，紀念一位偉人〉。取自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3937348351/Gysye8w1u>。
- Gongqingtuan zhongyang guanfang weibo (2018, September 9). Jintian, jinian yiwei weiren. *Xinlang weibo*. Retrieved from <https://weibo.com/3937348351/Gysye8w1u>.
- 李振羽 (1993)。《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北京：新影。
- Li Zhenyu (1993). *Zhongguo chu le ge Mao Zedong*. Beijing: Xinying.
- 李振盛 (2018)。《紅色新聞兵：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Li Zhensheng (2018). *Hongse xinwen bing: Yige sheying jizhe micang dipian zhong de Wenhua dageming*.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杜修賢口述、顧保孜執筆 (1997)。《紅牆裡的瞬間》。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Du Xiuxian koushu, Gu Baozi zhibi (1997). *Hongqiang li de shunjian*. Beijing: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 吳靖 (2012)。《文化現代性的視覺表達：觀看、凝視與對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 Wu Jing (2012). *Wenhua xiandai xing de shijue biaoda: Guankan, ningshi yu duishi*.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高仲明 (1978)。《毛澤東主席紀念堂》。北京：新影。
- Gao Zhongming (1978). *Mao Zedong zhuxi jinian tang*. Beijing: Xinying.
- 高維進 (2013)。《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Gao Weijin (2013). *Zhongguo xinwen jilu dianying shi*.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she.
- 晉永權 (2009)。《紅旗照相館：1956–1959年中國攝影爭辯》。北京：金城出版社。
- Jin Yongquan (2009). *Hongqi zhaoxiang guan: 1956–1959 nian Zhongguo sheying zhengbian*. Beijing: Jincheng chubanshe.
- 唐小兵 (2018)。《流動的圖像：當代中國視覺文化再解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Tang Xiaobing (2018). *Liudong de tuxiang: Dangdai Zhongguo shijue wenhua zai jiedu*.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陳曉卿 (2000)。《百年中國》。北京：中央電視台。
- Chen Xiaoqing (2000). *Bainian Zhongguo*. Beijing: Zhongyang dianshitai.
- 陳播 (2005)。《中國電影編年紀事(總綱卷·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Chen Bo (2005). *Zhongguo dianying biannian jishi (zonggang juan shang)*.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陳丹青 (2008)。〈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北島、李陀(編)，《七十年代》(頁47–6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Chen Danqing (2008). Xingkui nianqing—Huixiang qishi niandai. In Bei Dao, Li Tuo (Eds.), *Qishi niandai* (pp. 47–68). Xianggang: Niujin daxue chubanshe.
- 陳丹青 (2009)。〈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北島、李陀(編)，《七十年代》(頁59–79)。北京：三聯書店。
- Chen Danqing (2009). Xingkui nianqing—Huixiang qishi niandai. In Bei Dao, Li Tuo (Eds.), *Qishi niandai* (pp. 59–79).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陳韜文、李立峯 (2010)。〈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傳媒、社會組織、民族國家和集體記憶〉。《新聞學研究》，第103期，頁215–259。
- Chen Taowen, Li Lifeng (2010). Xianggang buneng wangji liusi zhimi: Chuanmei, shehui zuzhi, minzu guojia he jiti jiyi. *Xinwenxue yanjiu*, 103, 215–259.
- 郭鎮之 (2016)。《中外廣播電視史》(第三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Guo Zhenzhi (2016). *Zhongwai guangbo dianshi shi* (3rd ed.).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 梅桑榆 (2011)。〈在毛澤東逝世的日子裡〉。《文史天地》，第7期，頁56-59。
- Mei Sangyu (2011). Zai Mao Zedong shishi de rizi li. *Wenshi tiandi*, 7, 56-59.
- 張中江 (2014年6月23日)。〈紅牆攝影師杜修賢：榮辱皆攝影，我這輩子照夠了〉。取自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211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2117)。
- Zhang Zhongjiang (2014, June 23). Hongqiang sheyingshi Du Xiuxian: Rongru jie sheying, wo zhebeizi zhaogou le. *Pengpai xinw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211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2117).
- 葉聖陶 (1994)。〈一九七六年日記(三)〉。《新文學史料》，第3期，頁4-20。
- Ye Shengtao (1994). Yijiuqiliu nian riji (san). *Xinwenxue shiliao*, 3, 4-20.
- 新華社 (1976年9月10日 a)。〈公告〉。《人民日報》，第3版。
- Xinhuashe (1976a, September 10). Gonggao. *Renmin ribao*, p. 3.
- 新華社 (1976年9月10日 b)。〈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人民日報》，第2版。
- Xinhuashe (1976b, September 10). Gao quandang quanjun quanguo gezu renmin shu. *Renmin ribao*, p. 2.
- 新華社 (1976年9月12日)。〈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群眾懷著極其沉痛心情舉行隆重弔唁儀式〉。《人民日報》，第1版。
- Xinhuashe (1976, September 12). Dang he guojia lingdaoren yiji shoudu qunzhong huaizhe jiqi chentong xinqing juxing longzhong diaoyan yishi. *Renmin ribao*, p. 1.
- 新華社 (1976年9月19日)。〈首都百萬群眾懷著極其沉痛和無限崇敬的心情隆重舉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人民日報》，第1、4版。
- Xinhuashe (1976, September 19). Shoudu baiwan qunzhong huaizhe jiqi chentong he wuxian chongjing de xinqing, longzhong juxing weida de lingxiu he daoshi Mao Zedong zhuxi zhuidao dahui. *Renmin ribao*, pp. 1, 4.
- 新華社 (1976年12月23日)。〈為隆重紀念毛主席誕辰八十三週年《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彩色影片正式上映〉。《人民日報》，第2版。
- Xinhuashe (1976, December 23). Wei longzhong jinian Mao zhuxi danchen bashisan zhounian *Weida de lingxiu he daoshi Mao Zedong zhuxi yongchui buxiu caise yingpian zhengshi shangying*. *Renmin ribao*, p. 2.
- 新華社記者 (1976年9月12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懷著對毛主席無限崇敬和愛戴的心情，在毛主席遺體前肅立，瞻仰毛主席的遺容〉。《人民日報》，第1版。
- Xinhuashe jizhe (1976, September 12). Dang he guojia lingdaoren huaizhe dui Mao zhuxi wuxian chongjing he aidai de xinqing, zai Mao zhuxi yiti qian suli, zhangyang Mao zhuxi de yirong. *Renmin ribao*, p. 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8期(2021)

- 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4日)。*〈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陳錫聯、汪東興、烏蘭夫在弔唁大廳接待各國朋友和外交使節〉*。《人民日報》，第1版。
- Xinhuashe jizhe (1976, September 14). *Dang he guojia lingdaoren Hua Guofeng, Wang Hongwen, Zhang Chunqiao, Chen Xilian, Wang Dongxing, Wulanfu zai diaoyan dating jiedai geguo pengyou he waijiao shijie*. *Renmin ribao*, p. 1.
- 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5日)。*〈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汪東興、吳桂賢在弔唁大廳接待前來弔唁的各國同志和朋友〉*。《人民日報》，第1版。
- Xinhuashe jizhe (1976, September 15). *Dang he guojia lingdaoren Hua Guofeng, Wang Hongwen, Ye Jianying, Zhang Chunqiao, Yao Wenyan, Ji Dengkui, Wang Dongxing, Wu Guixian zai diaoyan dating jiedai qianlai diaoyan de geguo tongzhi he pengyou*. *Renmin ribao*, p. 1.
- 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9日a)。*〈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同志致悼詞〉*。《人民日報》，第3版。
- Xinhuashe jizhe (1976a, September 19). *Zhonggong zhongyang diyi fu zhuxi, guowuyuan zongli Hua Guofeng tongzhi zhi daoci*. *Renmin ribao*, p. 3.
- 新華社記者(1976年9月19日b)。*〈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開始，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百萬群眾一起肅立默哀〉*。《人民日報》，第3版。
- Xinhuashe jizhe (1976b, September 19). *Weida de lingxiu he daoshi Mao Zedong zhuxi zhuidao dahui kaishi, dang he guojia lingdaoren tong shoudu baiwan qunzhong yiqi suli moai*. *Renmin ribao*, p. 3.
- 新影(1976)。*《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北京：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
- Xinying (1976). *Weida de lingxiu he daoshi Mao Zedong zhuxi yongchui buxiu*. Beijing: Zhongyang xinwen jilu dianying zhipianchang.
- 新影批判組(1977年1月26日)。*〈深切的哀思 憤怒的聲討〉*。《人民日報》，第4版。
- Xinying pipan zu (1977, January 26). *Shenqie de aisi, fennu de shengtao*. *Renmin ribao*, p. 4.
- 楊正泉(2006a)。*〈毛澤東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後(上)〉*。《對外大傳播》，第8期，頁52-55。
- Yang Zhengquan (2006a). *Mao Zedong zhuxi shishi gongkai guangbo de beihou (shang)*. *Duiwai da chuanbo*, 8, 52-55.

消逝的「電子紀念碑」

- 楊正泉 (2006b)。〈毛澤東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後(下)〉。《對外大傳播》，第9期，頁48–52。
- Yang Zhengquan (2006b). Mao Zedong zhuxi shishi gongkai guangbo de beihou (xia). *Duiwai da chuanbo*, 9, 48–52.
- 楊正泉 (2009)。〈特殊歲月裡的幕後新聞〉。《時代文學》，第4期，頁12。
- Yang Zhengquan (2009). Teshu suiye li de muhou xinwen. *Shidai wenxue*, 4, 12.
- 趙捷 (2009)。《中華人民共和國圖像日誌》。北京：新影。
- Zhao Jie (2009).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tuxiang rizhi*. Beijing: Xinying.
- 劉效禮 (1993)。《毛澤東》。北京：中央電視台。
- Liu Xiaoli (1993). *Mao Zedong*. Beijing: Zhongyang dianshitai.
- 潘忠黨 (2000)。〈歷史敘事及其建構中的秩序——以我國傳媒報導香港回歸為例〉。陶東風、金元浦、高丙中(編)，《文化研究(第一輯)》(頁221–238)。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Pan Zhongdang (2000). Lishi xushi jiqi jiangou zhong de zhixu—yi woguo chuanmei baodao Xianggang huigui weili. In Tao Dongfeng, Jin Yuanpu, Gao Bingzhong (Eds.), *Wenhua yanjiu (di yi ji)* (pp. 221–238). Tianjin: Tianjin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 戴錦華(1999)。《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Dai Jinhua (1999). *Yinxing shuxie—90 niandai Zhongguo wenhua yanjiu*.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竇春起 (2007)。〈《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創作前後〉。《電影藝術》，第2期，頁137–141。
- Dou Chunqi (2007). *Jing ai de Zhou Enlai zongli yongchui buxiu chuanguo qianhou*. *Dianying yishu*, 2, 137–141.
- 顧錚 (2007)。《現代性的第六張面孔：當代視覺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Gu Zheng (2007). *Xiandaixing de di liu zhang miankong: Dangdai shijue wenhua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rmstrong, E. A., & Crag, S. M. (2006). Movements and memory: The making of the Stonewall My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5), 724–751.
- Barmé, G. R. (1996).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 Barmé, G. R. (1999).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58 期 (2021)

- Cohen, A., Boudana, S., & Frosh, P. (2018). You must remember this: Iconic news photographs and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 453–479.
- Dayan, D. (2008). Beyond media events: Disenchantment, derailment, disruption. In M. Price & D. Dayan (Eds.), *Owning the Olympics: Narratives of the New China* (pp. 391–402).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h, E. (2013). *The struggle for order: Hegemony, hierarchy, and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ms, V. (2017). A tale of two revolutions: Hungary's 1956 and the un-doing of 1989.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31(3), 479–499.
- Hepp, A., & Couldry, N. (2010). Introduction: Media events in globalized media cultures. In N. Couldry,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 (pp. 1–20). London: Routledge.
- Hubbert, J. (2006). (Re)collecting Mao: Memory and fetish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3(2), 145–161.
- Hung, C-T. (2007). Oil paintings and politics: Weaving a heroic ta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9(4), 783–814.
- Katz, E., & Liebes, T. (2007). “No more peace!”: How disaster, terror and war upstaged media ev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157–166.
- Langenbacher, E. (2003). Changing memory regim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y?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1(2), 46–68.
- Langenbacher, E. (2008). Twenty-first century memory regimes in Germany and Poland: An analysis of elite discourses and public opinio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6(4), 50–81.
- Langenbacher, E. (2010a). Still the unmasterable past? The impact of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German Politics*, 19(1), 24–40.
- Langenbacher, E. (2010b). Collective memory as a factor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 Langenbacher & Y. Shain (Eds.), *Power and the past: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 13–50).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C., Chan, J. M., Pan, Z., So, C. Y. K.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e, C-C., Li, H., & Lee, F. L. F. (2011). Symbolic use of decisive events: Tiananmen as a news icon in the editorials of the elite U.S. pr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6(3), 335–356.
- Lee, C-K., & Yang, G. (Eds.). (2007).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F. L. F., & Chan, J. M. (2016). Collective memory mobilization and Tiananmen commemoration in Hong Kong.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8(7), 997–1014.
- Li, H., & Lee, C-C. (2013). Remembering Tiananmen and Berlin Wall: Elite U.S. press's anniversary journalism, 1990–2010.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5(7), 830–846.
- Liebes, T., & Katz, E. (1997). Staging peace: Televised ceremonies of reconciliation.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2(2), 235–257.
- Pang, L-K. (2017). *The art of cloning: Creative production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 Perry, E. J.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udson, M. (1992).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 Somerstein, R. (2015). Newspapers commemorate 11 September: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Journalism*, 16(3), 359–375.
- Song, Y., & Lee, C-C. (2019). “Collective memories” of global media events: Anniversary journalism of the Berlin Wall and Tiananmen crackdown in the Anglo-American elite press, 1990–2014.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20(11), 1460–1479.
- Sonnevend, J. (2016). *Stories without borders: The Berlin Wall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iconic ev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ntag, S. (1977).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Su, C. (2012). One earthquake, two tales: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coverage of the 921 Earthquake in Taiwa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3), 280–295.
- Wagner-Pacifici, R. (2017). *What is an ev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u, J. (2006). Nostalgia as content creativity: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popular senti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9(3), 359–368.
-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elizer, B. (1998). *Remembering to forget: Holocaust memory through the camera's ey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本文引用格式

李紅濤 (2021)。〈消逝的「電子紀念碑」：毛澤東追悼會的圖像生產與當代中國記憶體制的變遷〉。《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8期，頁61–97。